

***Unearthing the Changes: Recently Discovered Manuscripts of the Yi Jing (I Ching) and Related Texts.*** By Edward L. Shaughness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xxii + 335. \$40.00.

*Unearthing the Changes: Recently Discovered Manuscripts of the Yi Jing (I Ching) and Related Texts* 是美國芝加哥大學從事上古中國 (Early China) 研究的資深學者夏含夷教授 (Edward L. Shaughnessy) 的新著。西方學術界翻譯《周易》的學者和著作不少，夏教授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曾出版馬王堆帛書《周易》的英譯本，<sup>1</sup>可以說是西方漢學界翻譯《周易》出土文獻最有代表性的學者。作者和我認識多年，學術交流不少，對於作者的專業領域 (中國古文字、中國古代史、中國考古學及傳統文獻) 以及研究方法，我有相當程度的了解。因此本刊邀請我替這部書寫書評，我沒有太猶豫就答應下來——其實我一向不喜歡寫書評，因為講負面的不討喜，阿諛之辭又沒意思。不過坦白說，作為《易》學界的同行，我對《周易》經傳的許多觀點和作者不同，在無法刻意隱藏個人觀點的情形下，我的評論必然帶有若干質疑或批評。幸而畢竟夏教授的著作是「主」，我的意見是「客」。相信我的評論不會干擾讀者欣賞這部書的心情。此外，由於評論的對象是一部英譯中國文獻，其中涉及漢語文本的訓解，因此用中文撰寫書評將更有利於讀者進入討論的脈絡。這是我並未以英文撰寫本文的原因。

這部書的基本結構，作者在「前言」(Preface) 結尾部分中有清楚的交待，除了前言、結論、附錄等必需的單元外，其實大約可分為四個單元。第一單元 (即第一章)，“Divining the Past Divining the Future: Archaeology and the Rediscovery of the Changes” 主要是從甲骨講起，將出土文物中的占卜材料與《周易》的語言及著占操作聯繫起來互相釋證，說明從獸骨龜甲等上古的占卜如何發展到《周易》的著占，將《周易》的占筮背景作了正面的描述。以下六章，每兩章為一個單元，分別介紹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的《周易》簡 (以下簡稱《上博易》)、阜陽漢簡的《周易》殘簡 (以下簡稱《阜陽易》)、王家台秦簡的《歸藏》簡 (以下簡稱《王家台歸藏》) 等三種出土《易》簡。這三單元六章，每一單元的前一章討論了簡的出土、文獻、歷史源流、相關研究等狀況，後一章則為翻譯。換言之，第二、三章討論了《上博易》，第四、五章討論《阜陽易》，第六、七章則討論《王家台歸藏》。

這部書具有相當學術水準，富有參考價值，原因有三。

第一，作者是受傳統漢學訓練的漢學家，對主題相關領域都有相當水準的專業知識。他尤其熟悉《周易》的各種版本、古代到近代的重要注解、歐美學者的多種英譯，具備這樣條件的學者在西方學術界並不多。作者在面對出土文獻《周易》內容極

---

<sup>1</sup> *I Ching: The Classic of Changes, The First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Newly Discovered Second-Century B.C. Mawangdui Texts*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97).

大的分歧時，常常能旁徵博引各種文獻來提出綿密的論證，意見均具有相當的參考價值。

第二，作者對於三種出土文獻都很負責任地提供了翔實的物質性介紹，包括文獻出土的背景、狀況，文獻殘存的情形，研究的過程，歷史的背景等（雖然，可能是限於篇幅，作者並未囊括所有最新的研究成果）。譬如《歸藏》的問題，由來已久。據《隋書·經籍志》的講法，《歸藏》在「漢初已亡」，但「晉《中經》有之」。<sup>2</sup>其實中古引述《歸藏》的文獻頗不少，魏晉以前讀過這部書的人很多。當然也有人懷疑中古學者所見的《歸藏》已非殷商的原本，而是戰國以降口述歷史演變為書寫歷史過程中，摻雜大量傳說成分甚至偽造成分的本子。清代馬國翰（1794–1857）等從事輯佚的學者曾將古代文獻（如《竹書紀年》、《山海經注》、《文選注》等）所引述的《歸藏》片段蒐輯起來，成為一集，即今《玉函山房輯佚書》中的《歸藏》。<sup>3</sup>《王家台歸藏》和清儒蒐輯的本子對照，頗可相印證，但它是否就是殷商的《歸藏》？如否，二者又具有何種關係？這些地方學界仍有不同見解。作者於第四章深入討論了《歸藏》的相關問題，表達了他相信此一文獻的態度，並敘述了整個文獻歷史的背景，供不能閱讀中文的英語系（Anglophone）讀者一個梗概，讓他們對出土《易》文獻背景有起碼的概念。<sup>4</sup>

第三、作者的中文底子好，整體而言全書翻譯謹慎，有選擇，偶會參考諸如 Richard Wilhelm (1873–1930) 等名家的譯本，但即使參考，顯然大部分經過作者考慮採擇。在全書前後，隨時都能讀到他如何推敲翻譯的遣詞用字。我特別提出這一點，是因為翻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翻譯作為一個專業領域，在近十年全球跨領域、跨文化的潮流下，因為閱讀市場擴大而獲得長足的發展。不過即使再專業的譯者，也很難完全克服個別學術專業領域所涉及各種專有名詞和概念的複雜性。我相信像作者翻譯《周易》這樣的經典，英語系的讀者不容易欣賞到譯者領會漢字字義的本領，中語系（Sinophone）的讀者也不容易理解譯者對英語詞彙做過什麼推敲。不過對於中英文根柢都好的讀者而言，相信不難看出這部譯著的用心。

然而，話說回來，上述三點肯定，並不代表本書毫無瑕疵或可議之處。事實上，從專業的《易》學角度看，本書值得商榷的地方相當多。出版社顯然沒有在付

<sup>2</sup> 魏徵等：《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卷三二〈經籍志一〉，頁913。

<sup>3</sup> 包含了五個單元：啟筮、鄭母經、齊母經、初經、本著。

<sup>4</sup> 近年賴貴三教授發表〈《歸藏易》研究之回顧與評議〉（《中國學研究》第58輯〔2011年12月〕，頁641–76），折衷二十年來諸家之說，認為王家台秦簡《歸藏》非殷商《歸藏》，亦非中古學者所見《歸藏》，也不是束皙所述「《易繇陰陽卦》二篇」。此與夏含夷教授推崇此一出土文獻的態度截然相反。雄按：王家台秦簡書寫於戰國時期，《歸藏》當然不可能是七、八百年前殷商的《歸藏》的複製，此不待賴教授考證即皎然可知，像簡文「師曰昔者穆天子卜出師而枚占」、「節曰昔者武王卜伐殷」的內容，追述殷商滅亡之後，西周鼎盛之時，就絕不可能直接承繼殷商《歸藏》的內容。然而，若說王家台秦簡《歸藏》和殷商《歸藏》全無關係，也有問題。相關討論，見拙著：〈易象新議〉，《人文中國學報》（待刊）。

印前將書稿交給專業的編輯將相關引文查證一遍，也應負一部分責任。不過我仍要重申，讀者應該注意到本文並不在於批評，而是要帶出問題，供《易》學研究者參考。

首先是《周易》和上古占卜傳統的問題。二十世紀初古史辨運動的學者認定《周易》就是占筮紀錄，源出古代巫師占卜迷信傳統，同時也用於占筮。這個看法相對於十九世紀以前的舊觀點來說，是非常典型的新典範 (new paradigm)，是二十世紀初學者對於舊典範認為《周易》是聖經，是聖人之書，含義就是《易傳》所闡述的思想 (因此「經傳」可以互相釋證) 等等觀點的一個總的激烈批判。這個建立於二十世紀初的新典範，綿延至今，快一百年了，影響非常深遠，屈萬里 (1907–1979)、高亨 (1900–1986)、朱伯崑 (1923–2007)、張政烺 (1912–2005)、勞思光 (1927–2012) 等各領域包括經學、文獻學、考古學、哲學的前沿學者全都深信不疑。歐美學者 Arthur Waley (1889–1966) 以及 Richard Alan Kunst 的英譯《周易》更參用了李鏡池 (1902–1975) 及古史辨學者的說法，日本學者自津田左右吉 (1873–1961)、小島祐馬 (1881–1966) 以下更不用說了。對於《周易》為占筮之書或卜筮紀錄的觀點，作者是否接受呢？他在 Preface 裡面的態度其實並未明朗。頁 xiv 他引述了顧理雅 (Herrlee G. Creel, 1905–1994) 的講法，說「《周易》包含了一種神祕的語言或玄奧的符號」 (contains a secret language or an occult symbolism<sup>5</sup>)；隨後即引用李學勤的講法，指《周易》「玄妙深邃，可以這樣解釋，也不難那樣推論」<sup>6</sup> (but subtle and abstruse; you can explain it this way, but it is also not hard to explain it that way)；然後歸結李學勤明言「考古」可以扮演重要角色 (archaeology can play a key role)，回應到他在 Preface 第一段宣稱上古中國占筮 (divination)、預知未來 (determine the future)、宗教生活 (religious life) 作為《周易》源起的重要性。換言之，作者在進入第一章前，就已安排好場景，將「考古」(包括出土文獻)、「占筮」、「宗教」和《周易》的撰著遠源連繫在一起。我們完全不用懷疑作者接受了古史辨運動學者視《周易》為占筮工具的觀點。作者在第一章很仔細地從考古資料、甲骨文比對《周易》的用語，說明了卜辭語彙與《周易》語彙有所不同。但儘管作者臚列了這些不同之處，他引述顧頡剛 (1893–1980)、高亨的看法，並且特別指出出土《日書》和《周易》特殊的用語高度一致，並舉出了出土數字卦資料，和阜陽漢簡「銜接在卦辭、爻辭之後，與經文沒有明顯的區分」<sup>7</sup> 的卜問辭相比較，從而推論出「用不同呈現方式去占卜未來是上古中國日常生活的重要內容」 (divination in all its various manifestations was an important feature of daily life in ancient China, p. 29)。這

<sup>5</sup> Herrlee Glessner Creel, *The Birth of China: A Survey of the Formative Period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New York: Ungar, 1936), p. 268.

<sup>6</sup> 李學勤為邢文《帛書周易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撰〈序〉，頁2。

<sup>7</sup> 韓自強：《阜陽漢簡《周易》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頁95。

樣一來，作者其實用了較古史辨運動學者更為細密的推論，回應並支持了他們的觀點。縱使作者注意到出土文獻的語言與《周易》（甚至《歸藏》與《周易》）有許多不同，但恰恰是透過更周詳的引證，作者較一個世紀前的古史辨學者更加坐實了《周易》為占筮紀錄的本質，及其與其他出土占卜文獻分享著同一個源頭的史實。讀者如讀第一章結論，當知我言之不誣。在這裡就出現一個非常嚴肅的方法論問題：將《周易》與眾多不同來源的出土文獻（包括簡帛、各種器物上的數字卦、日書）置於一起，何以見得觀其形貌的相似，就能進一步想像其相同處，推出一個高度概括性的結論，視《周易》本質為占筮呢？而且，即使說《周易》是占筮之書，究竟《周易》是將占筮的結果編集起來的產物？還是供古人占筮之用的一種材料呢？究竟是上古貴族紀錄他們對日常生活事件的占問，還是聖王神道設教的占筮聖典呢？這個問題，其實研究者從來沒有講清楚過。歷來研究者那樣影影綽綽地將《周易》和占卜聯繫起來，究竟有沒有先想清楚這些問題？持此論者每引朱熹（1130–1200）之說以為佐證，不知同樣講「《易》為卜筮」，朱子和後人大不相同。朱子說「《易》本為卜筮而作」之後，還強調「聖人恐人一向只把做占筮看，便以義理說出來」，<sup>8</sup>明白講出「卜筮」和「義理」從源頭上就是一體，和聖王的治世有關。這和古史辨運動學者卑視《周易》，將《周易》與流傳民間的問卜算命之書等量齊觀，像《古史辨》所收錄容肇祖（1897–1994）〈占卜的源流〉那樣極為輕蔑的講法，是大不相同的。事實上，容肇祖〈占卜的源流〉正是夏教授參考的文獻之一。從一個嚴肅的角度看，任何《易》學著作不能深入地、仔細地、具體地說明《周易》和占筮的關係，僅僅模糊地將《易》和一切出土文獻形貌相似的材料正面比附一下，即推論《周易》和占筮等量齊觀，都是非常危險的。

接著進入正題討論翻譯問題。本書有一些明顯的錯誤，譬如頁186引彌衡〈鸚鵡賦〉《文選注》引《歸藏》「金水之子其名曰羽蒙乃占之曰羽民是生百鳥」，但譯文將「百鳥」譯成“white bird”變為「白鳥」。這種錯譯，也許是無心之失，不足以為本書之病。不過以下這個例子就不是無心之失了。頁63討論《上博易》「井」卦六四「井甃亡咎」，今本作「井甃无咎」，作者引李零〈讀上博楚簡《周易》〉<sup>9</sup>討論「甃」字，將李文譯為英文，特別在「灑」字的旁邊加注“to leak”二字。在同一頁倒數第3行「井灑」旁亦注了“the well leaks”，顯然是將「灑」字讀為「泄」，故譯為“leak”，義為泄漏。當然「灑」字與「泄」字在後世是可通用的，「泄」可釋為泄漏而譯為“leak”亦無問題；但《周易》「井」卦的「井灑」之「灑」，歷來諸本未有作「泄」者，而從東漢以降諸家訓釋，皆用王弼《注》「不停污」之義，亦即孔穎達（574–648）《周易正義》所謂「治去穢污之名

<sup>8</sup> 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卷六六〈易二〉，頁1620–21。

<sup>9</sup> 《中國歷史文物》2006年第4期，頁63。

也。井被潔治，則清潔可食」。<sup>10</sup>以我的淺陋，從未見有注家釋為「泄漏」。我並不反對作者可以對此字有新解，但要捨棄舊說，恐怕仍須提供確切的證據才行。這一類古文字訓釋錯誤導致翻譯錯誤的例子，還不止這一處。頁176翻譯《歸藏》簡「借者起射羿而賊其家久有其奴」，作者譯為“*In the past Qi shot Yi and stole his family, for a long time having his slave.*”首先以理推斷古代奴隸社會，貴族的奴隸不會只有一個，*slave* 用複數 *slaves* 可能更為合理。而作者將「賊」字譯為“*stole*”可能是參考了《集韻》的解釋「盜也」之訓，其實並不正確，因為「賊」應訓為「害」。如《尚書·舜典》「寇賊姦宄」，孔《傳》：「殺人曰賊。」《詩經·大雅·抑》：「不僭不賊。」鄭《箋》：「不殘賊。」《左傳·僖公九年》引《詩經》此篇杜預《注》：「賊，傷害也。」<sup>11</sup>那麼作者“*stole*”的譯文肯定是錯誤的。

再舉一個古文字訓釋錯誤導致翻譯錯誤的例子，頁195譯《阜陽易》第58簡，「戰斷遼強不得志卜病者不死乃瘥·九四乘高唐弗克」。作者譯為：“... *battling: the enemy will be strong but will not obtain its will; divining about someone who is sick: if they do not die then they will get better · Nine in the Fourth: Riding on a high platform, you cannot ...*”韓自強解釋第58簡「瘥」字，說：「瘥：『癘』的或字，《說文》：『癘，罷病也。』《素問·宣明五氣篇》：『膀胱不利為癘。』」<sup>12</sup>夏教授顯然直接參考韓自強引《說文》解釋「癘」字「罷病」的解釋，卻將「罷」字讀為「罷休」的「罷」，意思是「不再生病了」，所以他譯為“*get better*”。然而，《說文解字》的「罷」字應該讀為「疲」，即《周禮·秋官·大司寇》「以圜土聚教罷民」的「罷民」，意指疲弊。<sup>13</sup>「罷病」就是極度虛弱，這才是「癘」（及「瘥」）字的本義，常指老年人虛弱引起病痛。《素問》所講的「膀胱不利為癘」，指的正是老年人前列腺肥大（*benign prostate hyperplasia*）引起小便困難的毛病。<sup>14</sup>所以，這段話正確的翻譯，不應該是“*get better*”而應該是“*get worse*”或“*get weaker*”才對。但這一理解的誤差，再據以譯為英文，文義就南轅北轍了。

翻譯的問題很麻煩，不但在於以上三個古代漢語訓解的謬誤，更麻煩的還在於中國古文獻裡的異文現象，尤其漢語漢字的「一字多義」（*polysemy*）的現象，所引致

<sup>10</sup> 《周易正義》，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整理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卷五，頁235。

<sup>11</sup> 《尚書正義》，《十三經注疏整理本》，卷三，頁89；《毛詩正義》，《十三經注疏整理本》，卷十八之一，頁1377；《春秋左傳正義》，《十三經注疏整理本》，卷十三，頁413。

<sup>12</sup> 韓自強：《阜陽漢簡《周易》研究》，頁85。

<sup>13</sup> 賈公彥《疏》：「罷謂困極罷弊。」見《周禮注疏》，《十三經注疏整理本》，卷三四，頁1062。

<sup>14</sup> 《漢書·高帝紀下》：「年老癘病，勿遣。」見《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卷一下，頁71。

《周易》的內容尤其是卦名有許多變異 (variation) 和多樣性 (multiplicity)。這種現象其實一直困擾學者和讀者。所謂「一字多義」，就是同一個字含有兩個或以上的意義。我早在 2005 年已經指出，《周易》一卦之中，常扣緊卦名而在各爻中演繹為兩種以上的意義。換言之，《周易》的作者清楚意識到漢字的多義性，因此故意不理會字的本義，在一卦中以卦名為中心，衍生出各種引申義。如「離」卦的「離」从「佳」，本義為「離黃」（即倉庚鳥），但於八卦之象為「火」（九四爻辭「焚如」即用此義。《象傳》稱「明兩作」，借「火」之象喻引申為「明」（即光明）；依《彖傳》解釋，在卦辭之義為「麗」（即附麗）；依九三爻辭「日昃之離」則為「落日」。整個「離」卦與「離」的本義毫不涉及，用的全是引申義。又如「井」卦的「井」既有「水井」義，又有「陷阱」義，故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兩句話的「井」兼有水井和陷阱義，是說水井最後無水（淤泥），用作陷阱則無禽（捕不到野獸）。<sup>15</sup> 夏教授在本書頁 61 討論了「井」卦此爻，歸結「舊井无禽」“should be read as a ‘trap’ (i.e., *jing* 阱) to catch wild animals”，其實並沒有完整掌握這兩句爻辭的意思，因為水井和陷阱是同一件事物：做了陷阱，並不改變它原來是一個水井的事實。所以這裡「舊井」一詞，仍應該理解為廢棄的水井。但抄寫者寫了「茭」，「阱」的意義就消失了；反之若寫了「茭」，「阱」的意義也丟掉了。今本寫成「井」，「茭」、「阱」兩個意義的區分也模糊了。這就是王引之《經義述聞》卷一大費周張地討論「井」卦這一條的原因。「井」的問題恰恰是「一字多義」的好例子。這一現象在上古抄寫過程中實不易保存或反映，因為歷代抄寫者在抄寫經文時，受限於文本物質的限制，並不可能同時寫下所有不同的字體（井、阱、茭）以求反映所有不同的意義。正因為所有抄本都只能選擇其中一種寫法，以寄託抄寫者自身解讀的意義，後世學者在閱讀不同的版本，遇到不同的字體，不但不會意識到抄寫者選擇某種特定寫法（例如《上博易》抄寫者寫成「茭」）其實反映了他對於文本的特殊理解及詮釋，同時，也注定忽略了其他未被選擇而呈現出來的字形及其寄託的意義。以現存《周易》出土的抄本寥寥數種，不難想像究竟還有多少這樣的現象存在於文本之中，而為後世學者所忽略。經典單單是抄寫過程，文字的多樣性即已不斷流失，在翻譯成另一種語言時，引起的問題就更大了。因為翻譯者倘沒有意識到「一字多義」現象，往往會誤以為一個卦名只有單一的本義 (original meaning)。譯者一譯，讀者接收到的信息就只有一種，《周易》「一字多義」的現象就更不為人所知。

「一字多義」的現象，常常反映於同一文本不同版本的異文。對於《周易》具有三、四種主要出土文獻而言，這真是考察此一現象的最佳場所和機遇。因為異文大致有兩類，一類僅僅是聲音相同的通假異文，那就是寫法不同讀音卻相同，異文的

<sup>15</sup> 說詳拙著〈從卦爻辭字義的演繹論《易傳》對《易經》的詮釋〉，載拙著：《周易玄義詮解》（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2 年），頁 79。

作用僅是標音，並不表述新的或者別的意義；另一類是含有另一種意義的異文，也許反映了這個字蘊含另一層意義，也就是前述的「一字多義」。不過作者似乎沒有這樣的意識，自然就沒有從這兩方面特別去區分這兩種現象。作者在全書處理《周易》卦名時，注音之外，兼作意譯；注音的部分，通例是就其字面注音，注的都是該字的本形之音，既不將它可能只是同一個字通假為另一字的「假借字」現象納入考慮。至於意義的翻譯，亦順著字面翻譯，就是作者所說的“interpret the manuscript literally, regarding it as one among several possible meanings” (p. 72, n. 5)，亦不考慮這些“possible meanings”相互間可能的關係（如井、阱、棊）。例如《周易》今本「乾」卦作者注音為“Qian”，馬王堆帛書《周易》作「鍵」，作者就直接注為“Jian”，甚至翻譯亦譯為“key”。作者這樣注音和釋義的方式，固然尊重了文本的物質性——文本寫成甚麼字，就注該字的讀音，釋該字的字義，不去主動判斷該字是假借字還是表述另一意義。但不幸地，這樣的做法等於完全隱藏了「通假」的現象（第一類異文），也讓讀者無法區分「通假字」和「一字多義」的現象（第一類和第二類異文的區別）。譬如頁48引今本「否」卦，作者注音為“Pi”，旁附馬王堆帛書《周易》「否」作「婦」，作者注音為“Fu”，並不理會「婦」實為「否」的假借。<sup>16</sup>又譬如「无妄」卦，《王家台歸藏》作「毋亡」，《上博易》作「亡忘」，寫法不同，但音義都沒有變。然而，作者注「无妄」就注音為“Wu Wang”，「亡忘」則注音為“Wang Wang”。<sup>17</sup>事實上，「无妄」（今本）、「毋亡」（歸藏）、「亡忘」（上博簡），甚至「无孟」（馬王堆帛書《周易》），豈會因為寫法不同而有不同的音義？這些例子一再出現，假借字的現象完全在這部書所反映廣闊的研究領域上消失了。「无妄」卦的翻譯，《王家台歸藏》作「毋亡」，作者譯為“Not Lost”（頁178）就算了，因為《歸藏》畢竟和《周易》屬兩個系統，意義未必一致。但同屬《周易》，作者將今本「无妄」譯為“Nothing Foolish”（頁95），《上博易》「亡忘」譯為“Forget-Me-Not”（頁94），《阜陽易》作「无亡」譯為“Nothing Gone”（頁245），這樣一來，一書中為同一個卦名提供了三種不同的翻譯，讀者要具備甚麼樣的知識，才懂得去理解、判斷三者之間的同異何在，並捕捉到一個完整的「无妄」卦卦義系統呢？

再例如《上博易》第1簡「龍」卦實即為今本「蒙」卦，但作者注音為“Mang”，翻譯為“The Shaggy Dog”（頁40），讀音既和今本「蒙」（作者注音為“Meng”）截然不同，在意義上“The Shaggy Dog”不但和該卦象、爻辭毫無關係，和作者將今本「蒙」卦字義譯為“Shrouded”，也迥不相侔，除非作為《易》學專家的作者在書中直接

<sup>16</sup> 但如頁40表2.1、頁44表2.2為《上博易》「既濟」、「未濟」卦（即今本「既濟」、「未濟」卦）時，作者卻仍注為“Ji Ji”及“Wei Ji”而不注音為“Ji Qi”及“Wei Qi”，即使意譯時亦依「既濟」、「未濟」之義譯為“Already Across”及“Not Yet Across”，而沒有譯出「濟」字的本義（《說文解字》：「雨雲起也。」）。

<sup>17</sup> 頁49、168。但頁48作者則注音為“Wuwang”。

說明何以「蒙」卦同時有“Mang”、“Meng”兩種讀音，以及“The Shaggy Dog”和“Shrouded”兩種意義，否則讀者閱讀至此恐怕只能掩卷浩嘆。我們看本書頁40表2.1列出《上博易》卦名及今本《周易》卦名注音對照表，頁72以後又列出這兩種《易》卦名卦辭爻辭的不同翻譯意義，讀者就這樣順著讀，見到那麼多不同字形、不同讀音，各有不同翻譯，既不能判斷它們是否通假，也很難去理解個別的卦名在不同版本彼此之間有甚麼意義關聯。那真是很讓人很迷惘的。本書頁72《上博易》第1簡的「六晶」，研究者都知道它即是「六三」，作者在同頁注1中也不憚繁瑣，特加說明，指出這個「晶」字不應該和義為“crystal”的「水晶」字混淆。老實說，如果全書各卦均能援引這個模式，一一解說，那一定清楚多了。作為研究著作，目前這樣的處理方式，實在很容易引起誤導。譬如像作者翻譯「歸妹」為“Returning Maiden”（頁273），直接截取「歸」字字面意思，問題實在太嚴重，因為這個「歸」字本義是女子出嫁，<sup>18</sup>在「歸妹」卦中也是用「出嫁」的意義，和“returning”這個英文字是風馬牛不相及的。

儘管我雞蛋裡挑骨頭提出個人所觀察本書的不足之處，<sup>19</sup>並不改變夏教授這部書是一部水準以上的學術著作的事實。讀者甚至不需要對《周易》有很深的了解，就可以在閱讀的過程中慢慢滲透到《易》的世界裡，有許多收穫。當然如果先讀一讀本文，相信多少會有些幫助。這部書要做出來，真是一點不容易——當然，如果讀者本身已有《易》學根柢，肯定會有更多收穫，因為它對於三種《周易》相關的出土文獻，並不是隨意翻譯一下而已，而是奠基於作者對《周易》廣泛深入的研究基礎上。我們必須要了解：一部書的價值，並不完全在於它的研究與學術(scholarship)毫無瑕疵，因為著作永遠是作者在漫漫求索、積累知識的過程中階段性的產物。有時甚至從著作出版的那一天起，作者就後悔了，有一種將未臻完美的產品赤裸裸地交給目光如炬的讀者的感受。正因為「學海無涯」，「學」是無止境的。就如“philosopher”一詞希臘語的語源義為「愛智者」(lover of wisdom)而非「智者」一樣。所以，嚴格而言，「毫無瑕疵」對任何作品而言都是不可能的。真正我們考察一部書的價值，應端視它是否有(或有多少)啟示性，能否讓讀者舉一反三，思及其餘。

鄭吉雄

香港教育學院文學及文化學系

<sup>18</sup> 《說文解字》：「歸，女嫁也。」《詩經·豳風·東山》：「之子于歸，皇駁其馬。」(卷八之二，頁614)

<sup>19</sup> 也有一些相信是作者寫作時的錯誤，如頁57提及「未濟」卦時說“the Nine in the Third line”，其實應作“the Six in the Third line”，因為「未濟」卦的三卦是陰而非陽。